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5.6014

抗战时期中共开展湘赣边国共合作的 困难、对策与启示

朱忠彪, 王启才

(中共湖南省株洲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编纂室),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回顾历史, 抗战时期湘赣边国共合作的主要困难是, 国共双方“十年对峙”的历史积怨难以消弭, 国共彼此“力量悬殊”导致团结合作难以协同, 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政治分歧难以调和。为克服国共合作面临的困难, 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之策, 彰显中流砥柱作用。抗战时期中共开展湘赣边国共合作的艰难历程和斗争经历, 昭示了战略思维是谋篇布局和采取策略的根本, 必须始终坚持大局为重、着眼长远; 其成功经验证实了方法和策略是化解矛盾、夺取胜利的途径, 必须始终坚持求同存异、兼容并蓄; 其表现揭示了斗争哲学是处理复杂问题的关键, 必须始终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关键词: 抗战时期; 湘赣边; 国共合作; 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 K265.1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5)06-0126-07

Difficulties, Countermeasures, and Insights from the CPC's Efforts in Promoting KMT-CPC Cooperation in the Hunan-Jiangxi Border Area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ZHU Zhongbiao, WANG Qicai

(Party History Research Office of Zhuzhou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Local Chronicles Compilation Office),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 A retrospective view of history reveals that the primary difficulties in achieving KMT-CPC cooperation in the Hunan-Jiangxi border area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ere as follows: the historical grievances accumulated during the “ten-year standoff”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were hard to dissolve; the significant “disparity in strength” made solidarity and coordination difficult to achieve; and the political divergences regarding the “united front” proved challenging to reconcile. To overcome the obstacles to cooperation and safeguard the National United Front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dopted a series of countermeasures, demonstrating its role as the mainstay in the struggle. The arduous journey and experience of the CPC in promoting KMT-CPC cooperation in the Hunan-Jiangxi border area during this period illuminate several key insights. Firstly, strategic thinking is fundamental

收稿日期: 2025-07-29

作者简介: 朱忠彪, 男, 湖南资兴人, 中共湖南省株洲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编纂室)教授级高级政工师, 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基层党建和社区教育。

to planning and adopting tactics; it is imperative to always prioritize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focus on long-term goals. Secondly, its successful experience confirms that methods and strategies are the means to resolve contradictions and achieve victory; it is essential to persistently seek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and embrace inclusivity. Finally, its characteristics reveal that the philosophy of struggle is key to handling complex issues; we must always uphold the principles of daring to struggle and being adept at it.

Keyword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Hunan-Jiangxi border area; KMT-CPC cooperation; united front

国共合作是国民党统治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决条件^[1]。抗战时期,中共开展湘赣边国共合作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国共双方“十年对峙”历史积怨难以消弭,国共彼此“力量悬殊”导致团结合作难以协同,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政治分歧难以调和。对此,中共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彰显中流砥柱作用。抗战时期中共开展湘赣边国共合作的艰难历程和斗争经历,昭示着战略思维是谋篇之本,必须始终坚持大局为重、着眼长远;湘赣边国共合作成功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折射出方法策略是破局之道,必须始终坚持求同存异、兼容并蓄;湘赣边国共合作的特点,揭示了斗争哲学是应变之要,必须始终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从湘赣边特殊的地缘政治视角,研究抗战时期中共开展湘赣边国共合作的艰难历程和斗争经历,分析湘赣边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治立场、主要特点、实际成效,探索中国共产党建立和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深层逻辑,能为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宏大历史课题提供新的思考,为准确把握伟大抗战精神核心要义、汲取历史经验智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湘赣边国共合作面临的困难

以湖南茶陵、江西永新、江西莲花三县为中心及其周边20余县组成的湘赣边区,是在井冈山、赣西南、湘东南三小块革命根据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曾经是湘赣省的辖区^{[2]356}。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引发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共开始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1937年7月抗日战争

全面爆发,随后《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正式形成。当时,远离侵华日军全面进攻的湘赣边区,由于地缘、政党、政治和军事等多重原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异常艰难。直到1938年2月,晚于全国半年左右,这里才正式形成国共合作的局面^[3]。

(一) 国共双方“十年对峙”,历史积怨难以消弭

湘赣边是中央苏区的拱卫地、前沿地,也是国共两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战场之一。中国共产党在此建立了湘赣革命根据地,也称湘赣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共产党在湘赣边界地区领导创建的第二个重要的革命根据地^{[4]2}。鼎盛时期,根据地包括赣江以西、株萍铁路和袁水以南、粤汉铁路以东、大余以北的湘赣两省25个县、2.8万平方公里土地、100万基本苏区人口,与赣东北、湘鄂赣等根据地互为犄角,有力地拱卫了中央苏区^[5]。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爆发,随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国民党为扑灭革命的火种,从全国各地集结重兵,先后五次对新生的红色革命政权进行大规模“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湘赣边地区进行了多次反“围剿”斗争,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殊死战斗。这些战斗不仅包括军事上的对抗,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较量。这场前后历时十年的斗争,是国共两党在革命道路上的一次重大交锋,造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给湘赣边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前后五次反“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共损失了8万多人。同时,湘赣边这场血腥斗争也给国民党军队

以沉重打击,消灭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仅第五次反“围剿”国民党军队就伤亡4万人,被俘35 000多人。可以说,湘赣边这场斗争是国共两党十年对峙和全面对立的集中演绎,战争的残酷和激烈,加剧了双方在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斗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国共两党必须摒弃前嫌,由战场上的生死对手转变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合作盟友,但双方在感情上、思想上长期积累的阶级仇恨和对立情绪一时难以消解。这无疑给湘赣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沟通渠道、重建互信增加了极大的难度。

(二) 国共彼此“力量悬殊”,团结合作难以协同

在长征前,全国工农红军编为35个军级番号,巅峰期人数达到30万人^[6];其中第三次反“围剿”时期中央红军为13万人,占全国三分之一强;但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湘赣边只留下少数零星部队在山上打游击。直到1934年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湘赣红军六军团突围西征后,这里才重新成为中共湘赣临时省委领导下的游击根据地^{[4][219]}。事实上,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在湘赣边已经大幅收缩,力量甚微。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按照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协议安排,湘赣边区游击队主力部队集中整编,从湘赣边向华北抗日前线集结,共产党在湘赣边的军事力量进一步被抽离。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随着抗日战争事态的全面扩大,湘赣边逐渐成为国民党迁都重庆后重兵集结的拱卫屏障,在这一区域国共两党力量对比悬殊。此种情境下,共产党在湘赣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导权、领导权和话语权处于相对弱势。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委派徐特立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的身份,在长沙建立了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推动全省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2月,湘赣边国共合作的局面正式形成^{[7][415]}。这种合作局面来之不易,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党人在坚持团结抗战基本原则基础上妥协、退让的结果,这一时期的国共合作远未达到彼此“资源政策协同、地缘战略互信”

的对等、平等状态。

(三) 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政治分歧,难以调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以及其他政治力量共同组成的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联盟。这一统一战线的形成,标志着国共两党结束长达10年的对峙状态,共同致力于抗日救国大业;但国共两党政治立场和利益冲突难以根本调和:国民党代表的是官僚买办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在中国表现为西方资本的利益代理人,这与共产党方面的“团结抗日、联合建国”的政治立场、政治主张存在根本冲突。国民党由“逼蒋抗日”到“联共抗日”,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国民党一贯主张一党专政,其片面抗战、消极抗战;表面上支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则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国民党当局迫于抗战形势日趋严峻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强烈呼声,其高层在抗战前线,更多地是以“联共抗日”的积极一面示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但在远离侵华日军的国统区后方,在国统区地方政府和军政部门,国共合作相关协议就走形变调了。湖南、江西都曾是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反共的老巢,两个地方一度由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何键等反共急先锋主政^[8]。这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沦为国民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工具和遮羞布,使得湘赣边国共合作充满很大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导致中共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面临着不应有的危险,不得不时刻提高警惕,加强戒备和防范。湘赣边国共合作正是在这样一种双方政治立场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艰难达成的,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相当脆弱。

二、抗战时期湘赣边国共合作中共的应对之策

为克服湘赣边国共合作面临的困难,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发挥中流砥柱作用,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之策。

(一) 开展和平谈判,签订协议,释放“政治犯”

1937年9月24日,项英等到达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高层谈判;26日,双方达成国

民党军队从各游击区撤退、国民党释放所有“政治犯”、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等事项的合作协议。1937年10月初,项英和陈毅为执行南昌谈判协议来到吉安城,与吉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谈判,很快便达成了吉安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被关押在吉安城及各县的共产党人先后获得了自由。吉安国共合作谈判成功后,陈毅亲赴湘赣边界山区,历经艰险,找到红军游击队,并说服他们集结在莲花县垅上村进行改编。1937年11月中旬,陈毅返抵吉安城,筹建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也是中共吉安中心县委机关,通讯处主任兼中心县委书记。中共以通讯处为掩护,在吉安城及其周边各县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和支持抗日团体和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2月,中共湘赣特委在永新黄岗成立了新四军留守处,负责铁镜山红军游击队改编的联络工作,受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指导。

1938年2月,根据中共东南分局的指示,谭余保、谭汤池、何德彪等人以中共代表身份,同茶陵、攸县、醴陵县等地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谈判的主要目的是:一方面,利用谈判的机会,进一步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及其意义;另一方面,表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决心与诚意。在谈判过程中,中共代表着重阐明了国共双方首先要摒弃前嫌、消除十年内战积怨,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共御外侮、一致抗日的正义立场。国民党政府迫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压力,加上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训示各县应予合作,湘赣边国共合作的局面正式形成。经过努力,曾被关押数年的20多名中共党员、红军干部获得释放。

（二）组建抗日群众团体，开创舆论阵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湘赣边是老苏区，群众觉悟较高，尤其是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学生，得知地方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消息后，纷纷自发地组织进步社团；地下党组织也运用各种方式，发动群众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占领舆论阵地。中共攸醴萍中心县委发动党员筹措300块光洋，先后开办了“前进”和“新地”两个书店，经销《新华日报》《救亡日报》《抗战日报》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革命进步书报。醴陵籍共产党员、原中共湖南

省委机关报主编黎澍于1938年8月在茶陵与人合作创办了《开明日报》，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中共醴陵石城金特支以子弟学校为名，成立“醴矿茶园”，创办《前进》周刊；茶攸安酃联立师范学生欧阳宗鉴等创办了《友声报》。这些报刊，坚持抗日、民主、进步的宗旨，从不同角度报道各地抗日消息，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力量的抗日主张，热情讴歌抗日英雄事迹，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暴行及反动本质，呼吁全国人民团结战斗、一致对外，其对发动群众抗日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和当地党组织的指导下，茶陵、醴陵、攸县等地发动文化界组织“抗敌后援会”。茶攸安酃联立师范学生谭树德、陈扬名等组织了“横展（读书）社”；攸县一批青年学生组织了“攸北学生宣传团”“攸县抗敌工作团”；留日学生蔡健回家后，利用其兄蔡仪在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工作的关系，在老家攸县渌田组织了“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渌田基站”，除组织本地青年学生外，还串联邻近的衡山（今衡东县境）、安仁交界的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与此同时，各地中共党组织通过“抗日救国会”“农抗会”等组织发动群众，宣传中共抗日主张。

（三）募集抗战物资，慰劳前方将士，救护伤兵难民

1938年11月长沙“文夕”大火，造成不少难民流落湘东，一批前线伤病员也转移到湘东各县。为了慰劳前方将士、伤兵，救护难民，各县都开展了募捐活动。醴陵抗敌后援会在全县开展“捐献一物”运动，共募集近万元光洋、上万件衣物鞋袜。攸县网岭、新市等地为救护难民、伤兵，成立了“人人救亡团”。“攸县抗敌工作团”在城乡发动群众募捐，还在湘东剧院举行“游艺募捐义演大会”，回攸避居的香港女歌唱家徐柳仙女士主动上台参加义唱。他们将这次游艺大会募集的物资、现金，有组织地用于慰劳驻在攸县万寿宫的伤病官兵。

（四）扩大党的组织，建立秘密抗日武装

针对抗日救亡活动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的情况，中共湘赣特委指示攸醴萍中心县委要见机行事，秘密扩大党组织。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到1939年，先后建立了茶陵八团、攸县山关和醴陵

城区、南四区、北二区5个区委,56个支部,发展党员600多人。在国民党控制区(如赣州、吉安)保留地下党网络,通过合法社团(如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等)渗透,为长期斗争做准备。同时,湘赣特委为在湘赣边建立抗日根据地,还指示各县党组织抓紧建立秘密武装。茶陵区委就在零江煤矿建立了20多人的矿警队;醴陵石城金特支组织20名工人积极分子(其中有3名中共党员)打入县警察大队;在王仙教书的余志宏,利用其伯父有30条步枪的条件,组织了“醴陵抗日自卫队”;中心县委还在醴陵城区吸收联保主任文家荣入党,掌握并控制了40条长枪;参加南岳干训班的酃县进步青年张春晖、谭希贤回县后,以王家渡、船形警察分所为基础,成立了“酃县抗日救国铁血团”群众自卫抗日武装^[9]。

(五) 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争取中间势力

这一时期,中共在湘赣边部分地区(如平江、浏阳)推动“三三制”政权建设,吸纳开明士绅和国民党左派,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但核心权力仍由中共掌握。同时,努力争取中间势力,通过联络地方实力派(如湘赣边部分国民党保安团)和民主人士,孤立反共顽固派,减少摩擦损失。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中共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为(如“平江惨案”),争取舆论支持;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原则,军事上自卫反击,政治上揭露其破坏抗战的行径。

中共在湘赣边的这些对策,体现了“合作不忘斗争、斗争不破合作”的辩证思维,其核心是通过统一战线凝聚抗日力量,同时以独立自主为底线,为最终夺取抗战胜利奠定基础。

三、湘赣边国共合作的启示

从抗日战争的全局来看,湘赣边虽然只是局部,但国共合作在湘赣边的形成发展历程,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中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国共合作历史经验及其折射出来的历史规律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一) 战略思维是谋篇之本:必须始终坚持大局为重、着眼长远

湘赣边国共合作局面形成的艰难历程,昭示着战略思维是谋篇布局和采取策略的根本。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经过土地革命和十年内战的对

峙,湘赣边实际上处于国民党统治区,是国民党事实上的势力范围。这一时期正是国民党“剿除”共产党红色苏区政权、迫使红军战略转移后“打扫战场”、忙着清除共产党游击队残留势力的时期。在这一特殊时期,要在湘赣边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党看来,无异于对国民党“剿共”成果的否定,其结果必然助长共产党势力和助推共产党在湘赣边区东山再起。这是蒋介石、国民党所不愿意看到的。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顺应全国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势,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推进湘赣边国共合作、消除相互对峙,其面临的矛盾和困难可见一斑。随着抗日形势的日趋严峻,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呼声日趋高涨,在中共中央和湘赣边特委的积极努力下,尽管国共双方多年积怨难以消解、政治分歧难以调和,但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关键时候,湘赣边国共双方最终摒弃前嫌、握手言和。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共合作之所以实现,最根本、最首要的是国共两党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都能够放弃党派和个人的利益,从民族安危和国家利益出发来调整内外政策。只有国共两党都放弃对立意识,才能够再度合作,携手抗日,共赴国难,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0]。历史经验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大局为重、着眼长远的战略思维,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去考虑和处理问题。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务必树立大局意识,形成从整体、大局、全局上考虑问题的思维习惯,坚决做到着眼大局、把握大局、服从大局、服务大局。

(二) 方法策略是破局之道:必须始终坚持求同存异、兼容并蓄

湘赣边国共合作成功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充分证明,正确的方法和策略是化解矛盾、夺取胜利的手段。湘赣边因其特殊的地缘政治状况和在抗日战争中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国民党基于政治意识、阶级立场不同,对共产党所倡导、推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被动接受的,甚至是消极抵制的,在这一地区要达成国共合作困难重重。湘赣边多为山区,信息不畅,当地的中共党组织不能迅速了解全国形势的变化和党中央关于时局的主张及其对方针政策的重大调整;同时,国共在湘赣边十年对峙,积怨颇深,共产

党内部和红区深受国民党迫害的人民群众也对“国共合作”存在误解,这无形中增加了党内进一步统一思想 and 做通红区人民群众思想工作的难度;加之国民党军并没有放松对湘赣边游击区的“清剿”,以至于有的游击区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停战协议后,湘赣边的红军游击队和国民党军仍在酣战中^{[4]216}。此种情境下,如何求同存异、寻找共识,是打破对立僵局的关键。中共东南分局根据“日本侵略军在京沪得手,南进无疑,湘赣边区遭受沦陷只是时间问题”的敏锐判断,提出了在湘赣边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主张。1938年1月,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和副书记曾山来到莲花县垄上村^{[7]412},决定撤销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新成立中共湘赣特委,任命谭余保(新四军参议)为特委书记,由他率一支80多人的“特务队”继续留在湘赣边集聚力量^{[7]413},一边做统战工作,一边做群众工作,等待承担以后在湘赣边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的任务^{[4]216}。为此,谭余保率几十人半公开移驻湖南茶陵与江西永新交界的几个山村,着手恢复党的组织,以应抗战之需。半年过后,国民党方面也有了共识。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武汉,呈南北夹攻打通粤汉线的态势,湖南即将以粤汉铁路为界被一分为二。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湖南国民政府立即做了疏散准备,一部分迁往西边的湘西沅陵,一部分迁往湘东的茶陵等地。以刘岳厚为代表的部分国民党地方派人士撤到了茶陵^[11]。他们之所以撤到茶陵,是因为国民党湖南当局要“在湘赣边境发展抗日游击战”^{[2]357},也就是说,要在湘赣边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国共双方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目标一致,为湘赣边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了共识、畅通了渠道。

湘赣边以建立抗日根据地突破口达成国共合作的经验,凸显了“求同存异”的重要性、关键性,这是策略问题,也是方法问题,更是原则问题。实践充分证明,策略方法掌握好了,再大的困难都能克服,再难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之所以能够进行合作,与实行“求同存异”的方针密不可分。

(三) 斗争哲学是应变之要:必须始终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湘赣边国共合作的特点,揭示了斗争哲学是

处理复杂问题的关键。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呈现出鲜明的“既合作又斗争”的规律特点,可以说这一规律特点贯穿了湘赣边国共合作的全过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国共合作,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任何一方都要审时度势、顺时应势、谨慎作为。正是基于这一基本认识,湘赣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得以艰难形成。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是阶级基础、性质完全不同的党,国共合作并不意味着两党意识形态、阶级立场的根本改变,也不表明两党政治分歧、血腥仇怨的完全消弭,更不是互相吞并、相互融合。所以,这种合作具有目标单一性和状态暂时性的特点。为了抗日,中国共产党必须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血的教训以及共产党人革命纲领的要求,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国民党是执政党,它对共产党的既定方针是限制其发展、直至消灭。中共如果事事都要同国民党协商,事事征得其同意,那只能是把自已的手脚束缚起来,向国民党全面投降^[12]。由此可见,在国共合作中国共两党相互斗争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为此,中共不仅制定了国共合作的正确路线、方针,而且适时地提出了许多处理合作中出现问题的政策、方略,对顽固派的斗争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从而既确保统一战线得以维持,又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先进性得以保持。关于国共合作中的“斗争”问题,在湘赣边“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问题上得到了集中反映。国民党蒋介石因担心南方国统区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队做大,先是提出要作为“赤祸”予以“根绝”,随后又想借“改编”之名予以吞并。中共因为几次与蒋介石就南方红军游击队问题谈判无果,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生存和发展格外关注。当国共两党于1937年10月就南方红军游击队问题达成协议之后,10月30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博古、叶剑英,提醒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要“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国民党派遣任何人。同时严防国民党暗算,森严自己壁垒”“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表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对国民党方面亦存有“戒心”。

抗日战争时期湘赣边国共合作既是“合作”史,更是“斗争”史,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斗争求团结”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胆识。这一“斗争”

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并非蛮干,而是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争艺术,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坚持立场原则,抓住斗争规律,讲究斗争策略,紧盯关键要素,围绕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斗争。要在斗争中讲团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要在斗争中求合作,在斗争中谋共赢,实现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的完美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号召全党同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13],这为新时代传承革命斗争精神、树立正确的斗争意识指明了方向。当前,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必须始终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斗争精神。要保持政治定力,把握正确方向,善于灵活运用斗争策略和方法,不断提高斗争本领。要把握斗争规律,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要把握大局大势,分清轻重缓急,科学排兵布阵;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根据形势需要及时调整斗争策略。

总之,抗战时期湘赣边国共合作来之不易、弥足珍贵,其合作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既具有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的本质特征,又因其所处的特殊地缘环境和政治环境,在国共合作过程中呈现出目标单一、斗争为主、整合乏力的历史局限。为克服国共合作面临的困难,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之策,其历史经验及其折射出来的历史规律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 顾群.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湖南[J].求索,1985(5):92-96,100.
- [2] 胡涤非.湘赣边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战争[G]//中共株洲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民主革命时期株洲党史资料:第四辑(1934.8—1949.10).株洲:中共株洲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2005.
- [3] 戴安林.中共湖南党组织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5,26(5):24-29.
- [4] 湖南红色基因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湘赣革命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3.
- [5] 徐飞.湘赣革命根据地:拱卫中央苏区的战略左翼[N].人民日报,2021-06-16(6).
- [6] 张国琦,李国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沿革(1927—1949)[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9.
- [7] 中共株洲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株洲历史:第一卷(1919—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 [8] 曾长秋.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湖南[J].怀化学院学报,2005,24(4):63-65.
- [9] 中共株洲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编纂室).共铸湘东人民的英勇抗战魂[N].株洲日报,2025-09-01(4).
- [10] 贺静.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本经验及现实启示[J].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1999(S3):1-3.
- [11]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第1卷(1920—1949)[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440.
- [12] 刘玲灵,张殿祥.浅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基本经验和教训[J].沧桑,2007(5):37-38.
- [1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2.

责任编辑:黄声波